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三十六

仪式圣地的兴衰

辽西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化进程

李新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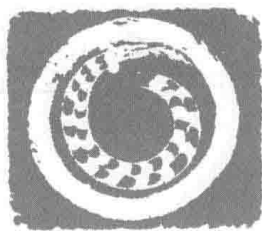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三十六

仪式圣地的兴衰

辽西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化进程

李新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仪式圣地的兴衰：辽西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化进程 /
李新伟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1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ISBN 978-7-5325-8641-7

I.①仪… II.①李… III.①史前文化—研究—辽西
地区 IV.①K29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1996 号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仪式圣地的兴衰：辽西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化进程

李新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93,000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7-5325-8641-7

K·2395 定价：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伯谦

副主任：王天有 王邦维 程郁缀 郭之虞

徐天进 赵化成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有 王邦维 李伯谦 严文明

宋豫秦 赵化成 赵辉 拱玉书

夏正楷 徐天进（常务） 高崇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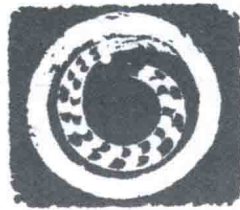
郭之虞 程郁缀

Auro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Publication Series , No.36

Rise and Fall of Sacred Ritual Center: Characteristic Trajectory of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Prehistoric Liaoxi Area

Li Xinwe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序

2004年,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考古系的中国留学生李新伟顺利通过了论文评审获得博士学位,为他艰辛的四年留学生涯画上一个成功的句号。没有澳大利亚留学经历的人很难想象,中国留学生要在短短的三四年之内完成多少工作:不仅要掌握考古学的西方理论,学会多种分析方法,进行田野工作获取第一手资料;还要制定理论性的假设,运用各种考古学方法来检验这些理论,以便恢复数千年前的社会发展进程;当然还有用英文专业词汇表述复杂的思想,写一篇数百页的论文等。在此之后要经过三个校外评审者的严格甚至是苛刻的审查,然后是进一步修改……我想,当李新伟收到论文通过的通知时,一定感到像是在漫漫长夜的征途中终于见到曙光一样可以喘口气了,而那也是我们周围每一个人为他感到万分骄傲的时刻。

13年之后,我们看到的这本专著是李新伟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修订并增加不少新资料的中文版。阅读过程中令我不禁回忆起那些年在澳大利亚工作时和中国留学生们教学相长的难忘岁月,而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发展问题则是和李新伟聊天的主要话题。他思路敏捷,举一反三,经常有新的灵感出现,这些思想火花都显现在本书的章节中。

博士研究生往往都是雄心勃勃的,要在自己的论文中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揭示前人没有发现的真谛,而李新伟便是其中之一。他的论文命题是要描述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四千年中复杂社会的兴衰过程,分析社会政治结构、生计模式和意识形态,揭示社会变化的动力,并解释衰落的原因。这些都是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涉及有关复杂社会发生、发展的人类学理论,更重要的是掌握必要的方法将零散的原始材料整理成可以检验理论框架的数据,同时还要兼顾人文的哲理和科学的实证。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诠释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他用“三个怪圈”来概括。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利用西方人类学理论,他虽然基本倾向于采用过程考古学传统的进化论及其相关理论来解释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但并不拘泥于单一的理论体系,因此广泛涉及酋邦、国家、手工业生产专业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讨论。第三是如何梳理和分析庞杂的考古资料,他运用研究聚落考古的多种分析方法来剖析从家户、村落到地域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结构。这些方法包括区域性全覆盖式田野调查,使用量化方法分析遗址等级关系,并且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区域性的遗址分布、人口与土地利用的关系,以及村落内部社会阶层的出现等问题。可以说,这些理论和方法在本书中的运用,相当成功地再现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化的历史进程。

红山文化的兴衰是一个考古界长期以来十分关注的问题,是本书分析的重点,包括多

学科知识的运用,也是论述最深入的部分。李新伟从玉器的形制出发,结合中国古代宇宙观的核心因素,复原玉器所负载的思想内涵。张光直先生用“相互作用圈”解释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广大地区出现文化相似性的观点显然对李新伟研究红山文化的性质有重要启发。他将不同地区某些类似的玉器形制与酋邦社会中酋长的政治功能联系起来,认为文化交往的内容包括不同地区的上层人物之间交换有关宇宙秩序的知识,是获取政治地位的手段。因此给予相互作用圈这一较抽象的文化概念以具体的物质、精神以及人类行为的内容。这些都是颇有新意的分析方法,对以往研究考古学文化交流时采用的概念性或文学性语言解说的传统是一个重要突破。

李新伟对于红山文化衰落的解释不是将气候变化和考古学文化兴衰作简单对应,而是探究人类在环境压力下的应对措施以及因此产生的后果。由此进一步揭示红山社会上层阶级所采取的是一种超自然的政治决策方式,无助于应对长期而日趋严重的环境恶化。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红山文化晚期爆发式的宗教礼仪活动的出现,以及相关的大型公共建筑的流行和大量玉器的制作。在干旱气候的威胁下,红山文化先民的应对方式显然并没有超出求神拜祖一类的宗教仪式。

当然,本书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来计算红山文化聚落人口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分析方法,但是在运算前如何确定所需的变量并不容易。例如作者假设红山文化是以粟作为主的农业社会,因此对聚落所需土地的计算是根据粟的产量。但红山文化是否所有地区都是以粟作农业为主,这其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浮选结果来看,兴隆沟和魏家窝铺遗址中红山文化地层出土的粟黍遗存都非常少,白音长汗遗址中红山文化的磨盘、磨棒上的残留物中有多种块根及禾本科植物,但粟黍比例极低。而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不同遗址的人骨具有不同的碳四植物比值。这些结果说明红山文化分布区域的聚落之间存在生计形态方面的差异,不完全是以粟作农业为主,而采集野生植物在一些地区可能还很重要。因此,如何分析红山人的生计模式和土地利用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当今的中国考古学,几乎每天都有新资料和新分析手段产生,也使我们必须经常重新审查以往的结论。我们对辽西地区史前社会的认识也会不断改变,但不论从理论建树还是材料分析方面来看,这部专著都可称为是研究一个地区史前文化演进过程的优秀范例。

刘 莉

2017年8月28日

目 录

序	(i)
第一章 “第三个怪圈”：研究背景回顾	(1)
第一节 “大一统怪圈”	(1)
第二节 “第二个怪圈”	(10)
第三节 “第三个怪圈”	(12)
第二章 理论和方法	(16)
第一节 进化论：单线和多线	(16)
第二节 酋邦研究的回顾	(20)
第三节 酋邦的考古学研究方法	(28)
第三章 研究回顾	(34)
第一节 自然环境	(34)
第二节 研究回顾	(35)
第三节 蚌河和老虎山河调查	(39)
第四节 研究思路	(40)
第四章 家户内的仪式：兴隆洼文化	(42)
第一节 文化特征	(42)
第二节 基本经济形态	(48)
第三节 家户分析	(50)
第四节 社区分析	(59)
第五节 区域聚落形态	(66)
第六节 资料分析	(67)
第七节 小结	(72)
第五章 社群仪式：赵宝沟文化	(74)
第一节 基本文化特征	(74)
第二节 经济基础	(79)
第三节 家户分析	(80)

第四节	社区分析	(86)
第五节	区域聚落形态	(92)
第六节	资料分析	(94)
第七节	小结	(99)
第六章	圣地仪式(一)：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的发展	(101)
第一节	基本文化特征	(101)
第二节	经济基础	(108)
第三节	红山时期聚落形态	(110)
第四节	仪式景观	(115)
第五节	专业化生产	(127)
第六节	“酋邦级”社会的形成	(129)
第七节	小结	(134)
第七章	圣地仪式(二)：红山文化社会的超自然取向	(135)
第一节	红山新意识形态的形成	(135)
第二节	红山农业经济规模	(141)
第三节	红山社会复杂化的形成	(147)
第四节	红山社会上层的领导策略	(148)
第五节	小结	(153)
第八章	从超自然到世俗：红山社会复杂化的衰落	(155)
第一节	文化面貌和经济基础的变化	(155)
第二节	社会复杂化的变化	(158)
第三节	意识形态的变化	(164)
第四节	红山复杂社会的衰落	(168)
第五节	小结	(170)
第九章	“中国相互作用圈”视角下的辽西地区	(172)
第一节	辽西地区的独特文明化进程	(172)
第二节	打破“第三个怪圈”：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不同轨迹	(177)
第三节	“多元”与“一体”的统一	(178)
参考文献		(181)

第一章 “第三个怪圈”：研究背景回顾

苏秉琦在其《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开章明义,指出束缚中国考古学研究,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大一统怪圈”的具体表现是“我们习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这也使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关系若明若暗”。在史前考古研究上的表现就是一直强调黄河流域的核心地位,认定大一统格局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出现。僵化套用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怪圈的表现是,“我们习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历史本身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把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的、全部的历史,就把活生生的中国历史简单化了”。“结果大量丰富的考古资料也只能‘对号入座’,把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当成教条,再添加些考古资料便交差了事”(苏秉琦 1997: 2~3)。在苏秉琦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家一直在努力挣脱两个怪圈的束缚,创建考古学研究的“中国学派”,这种努力被国内外学者公认为近三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流(郭大顺 2001a;张忠培 2000; Falkenhausen 1999; Wang 1997)。

这两个怪圈的归纳,实际涉及了中国史前史研究的两大主题:文化格局角度上的“最初的中国”的寻找和社会进化角度上的“文明”的认定。本章将简要回顾两个怪圈的形成和中国考古学家奋力冲破怪圈、确立“最初的中国”和最早的“文明”的努力,以此为全书提供一个学术大背景。

本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图,即指出阻碍中国考古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史前史研究的“第三个怪圈”——对史前各地区文明化进程一体化的过分强调。挣脱出前两个怪圈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正在受到这个怪圈的困扰。本书虽然只是对中国史前时代一个重要文化区的文明化进程的个案研究,但真正的“野心”却在于跳出这“第三个怪圈”,探索认识中国文明化进程或早期国家起源的新视角。

第一节 “大一统怪圈”

一、民国的“大一统”和考古学的使命

《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明确提出大一统观念。颜师古

注云：“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此概念的核心是维护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以威服四方，维系庞大的整体。经过秦汉王朝的实践和发扬，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大一统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晁福林 2009），成为各历史时期王朝最着力宣扬和维护的政治理念。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轰然倾倒，中华民国浴血新生。清末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期盼一个强大统一、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虽然革命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为了团结各族人民共建民国，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各民族的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自大一统思想产生起，就出现了两种证明其合理性的方式：一是将其比附于天道，二是追述上古圣王一统天下的黄金盛世。已经受到科学精神洗礼的新生民国的领导者和知识精英自然不会附会天道，而是选择了后一种方式——黄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被大力宣扬（Liu 1999, 2000a; Liu and Chen 1999）。正在此时，新文化运动蓬勃而起。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是新文化运动在史学界的先锋。顾颉刚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论断，否定了整个三皇五帝时代，并质疑在西周以前是否有真正的天下一统（顾颉刚 1982）。传统古史系统崩溃，中国上古史的黄金盛世受到质疑，大一统观念失去了强大的依托。中国上古有什么样的人文和政治景观成为国人热切期盼解决的问题。

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新生的现代考古学。顾颉刚自己就提出，“我知道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顾颉刚 1982：50）。胡适在《自述古史观书》中也说，“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十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胡适 1982）。现代考古学因此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并承担起“科学地”重建古史的重任。当时考古工作的中心就是寻找中华文化的源头，工作地域则集中在黄河中游这一古史记载中的五帝及夏、商、周三代活动的中心。

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1921年6月发掘了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Andersson 1923a），10月才到河南渑池仰韶村进行发掘（Andersson 1923b）。但仰韶的发掘引起了更大的反响，确立了中国第一个史前文化——仰韶文化，该发掘后来被认定为现代中国考古学产生的标志。这固然与仰韶遗址遗物丰富有关，但更与其地处文献记载中的中国文明的核心地带密不可分。

如果说安特生的发现只是他兴趣所至，无意偶得的话，中国考古学家重建古史的愿望则更加迫切和明确，而且明显力图以考古资料印证被质疑的古史记载（Falkenhausen 1993）。

1925年底，公认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李济所在的清华大学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签订协议，由该馆资助李济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1926年初，李济与袁复礼同行，赴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调查，并选择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李济选择此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献记载的尧、舜和夏的活动区域都集中在汾河流域，他明显意在探寻以考古资料印证古史传说的可能性（李济 1927）。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开始了对

殷墟的发掘,这是中国官方学术机构组织的首次田野考古工作,其目标是当时被质疑的殷商史的重建。同样在1928年,从清华大学返回齐鲁大学任助教的吴金鼎在山东章丘龙山镇调查,发现了城子崖遗址,为以考古资料重建古史找到了新的线索(吴金鼎1930)。1930~1931年,史语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正式发掘,确立了龙山文化。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呈现出的东西并立的格局,与时任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经梳理文献提出的“夷夏东西”的上古时代文化格局颇为契合(傅斯年2003),殷墟的发掘更是直接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可信性。考古学重建古史初见成果,极大地鼓舞了考古学家们的信心,激发了学术界的热情。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古史重建工作明显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这与当时的考古发现有关,也与黄河流域为古史记载中的中国文明中心有关。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开展,促使考古发掘全面展开。1949年以后,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大量增多。至1979年,“建国三十年以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已超过六七千处,大规模的调查发掘遍及全国,新的发现丰富多彩,文化类型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日益深入”,经过发掘并成为考古学文化和重要类型命名地的遗址即有数十处(任式楠2010)。面对大量新发现,梳理异彩纷呈的考古遗存的时空关系,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首要任务。夏鼐于1959年发表的《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为时空框架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张忠培1994)。70年代,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应用又为框架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发表第一批碳十四数据,安志敏著文,分别讨论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西北地区、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和西南地区的文化序列;1981年又发表论文进行了更细致的探讨,设立“仰韶文化的类型和变体”、“龙山文化的再认识”、“江汉地区的诸遗存”、“长江下游的文化序列”、“东南和西南的遗存及有关问题”诸小节(安志敏1972,1982)。1977年,夏鼐著文,参照碳十四年代全面地叙述了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文章按照中原、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黄河下游和旅大地区、长江中下游、闽粤沿海、西南地区、东北地区七个地区展开讨论(夏鼐1977)。

这些经典论文的发表,可以作为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年代初步建立的标志(李新伟2012)。

在这一长达三十年的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建设过程中,考古学家们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田野发掘和以地层学为依据的类型学排比,确立新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成为研究的重点。同时,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国家起源的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考古学研究中,以中国考古资料验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成为中国考古学家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半坡类型是否处于母系社会,大汶口文化是否发展到了父系社会等问题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热点问题。

但对于重建古史和整体格局演变的思考并未停止。195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尹达即指出,“我国境内这许多不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由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在纵横交织着的繁复错综的关系中向前发展着;这些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系统

的文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就逐渐形成中国古代史上的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文化。如果科学地系统地加以分析和研究,把地下遗存的资料整理出一个眉目来;再结合我国丰富的古代传说和少数民族的现实资料,做进一步的研究,这将使我国原始社会的研究获得更大成果”(尹达 1955)。表露出寻找中国历史时期文化格局的史前基础的意愿。

二、“黄河流域中心”模式

由于当时仍然以黄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最为引人注目,也由于当时确认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等“前仰韶文化”仅发现于黄河流域,“黄河流域中心”模式成为构建中国古史的主导模式。此模式常被称为“中原中心论”,但实际上它强调的是以整个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核心作用和强大影响力,以这种影响力作为维系各地区文化、构成史前中国文化体系的纽带。

20世纪50年代,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的事实被确认后,以“夷夏东西”为指导的仰韶和龙山两大文化东西对立的旧模式即受到了严重挑战。但“夷夏东西”模式赋予黄河中下游的核心地位并未受到质疑,只不过仰韶和龙山的東西并立变成了前后相继,黄河中下游仍然被认为在中国史前时代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心。因此,在对于中国史前核心地带的认定,以及核心地带的领导和维系作用方面,新旧两个模式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1959年,安志敏在阐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为早晚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而非东西对立并存后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黄河中下游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阶级社会统治王朝夏、商、周的产生与发展,也与这里的新石器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据近年来所发现的丰富资料,仰韶文化是发生在黄河中下游而经过长期发展的一种新石器文化,继而兴起的龙山文化,至少在豫、晋、秦一带可能是从仰韶文化发展来的。龙山文化也同样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而历史上的‘夏’文化,便要从这个地区的晚期文化中去探求。……据以上看法,则龙山文化承袭着仰韶文化,而‘夏’和殷代文化又与龙山文化有密切的联系。至于西周文化,则是从陕西龙山文化中演化出来的,它们的发展系统还都比较清楚。这种悠久的文化传统与不可分割的联系,奠定了中华民族古代历史的发展基础。”(安志敏 1959)

石兴邦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中心地区,历史上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以这一地区为核心的。黄河流域考古学上主要问题的解决,直接间接地有助于其他地区历史问题的解决。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居民与边疆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活动,就拧结成了一条紧密的历史纽带。”(石兴邦 1959)

黄河流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引领着周边地区的发展,并使得周边地区自史前时代开始便成为一个有“中央”的整体,而黄河流域又沿着母系社会—父系社会—军事民主制—国家的经典道路发展,孕育出夏、商、周三代王朝——这一模式将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起来,以此建立了与时代背景和学术积累相适应的“中华民族

古代历史的发展基础”。

这应该说是利用新的考古资料进行古史重建的重要成果,但同时也深受“第一个怪圈”即大一统思维模式的束缚。

三、“多元一体”

20世纪80年代,随着红山文化及良渚文化高等级遗存的发现,一个清楚的事实摆在了中国考古学家面前——黄河流域并不总是处于领先地位。辽西地区兴隆洼遗址的发掘和兴隆洼文化的命名,更说明“前仰韶”文化并非黄河流域独有,中国史前各文化区可能有自己相对独立、与其他地区基本平行的发展道路。“黄河流域中心”模式因此受到严重挑战。

早在20世纪60年代,苏秉琦就对“黄河流域中心”模式产生了疑问(苏秉琦 1965),其思想源头更可以追溯到徐旭生提出的“三集团”说(徐旭生 1985)。1981年,苏秉琦将以前的思考整理成文,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区系类型”说(苏秉琦、殷玮璋 1981),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1997年改为“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见苏秉琦 1997)、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图1-1)。

苏秉琦提出此文化区系的目的是不是梳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而是要强调两个核心内容:一是各区系沿各自的道路发展,均达到过相对高的社会发展程度,出现“文明曙光”,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二是各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自己的“裂变”外,相互间也有密切互动,表现为“撞击”和“融合”,即区系间的相互学习和某些区系对其他区系因素的兼容并蓄。这一模式正与费孝通1989年正式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呼应(费孝通 1989),力图摆脱“黄河中心”模式的大一统思想,开启以“多元一体”模式建立中国史前基础的新时代。

但“区系类型”模式侧重强调各区系的多元性,在各区系何以凝结为“一体”方面未作详细讨论,也许是认为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因为这些区系都在现代中国的疆域内,也多在秦汉帝国的疆域内。苏秉琦和他的学生们常以“庖丁解牛”比喻“区系类型”模式的贡献,认为“黄河中心”模式将中国史前文化视为一头“全牛”,忽略了各地区的独立发展,而“区系类型”模式则游刃有余地划分出了各个相对独立发展的区系,黄河流域不再是核心纽带,只是全牛的一个部位而已。但他们并没有认真讨论,否认了黄河流域的维系作用后,为什么还可以将各地区看作一个整体,是一头牛的不同部分,而不是不同的牛?

在各区系的关系上,苏秉琦虽然指出各地有自己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和社会发展道路,但非常诗意地提出由“华山玫瑰”到“燕山龙”,再到“汾河岸边磬和鼓”的文明火炬接力传递的模式,即认为以华山南侧的豫西和关中为核心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彩陶发达、社会发展一度领先,影响到了以燕山北麓为核心地区的红山文化,激发了其社会发展,出现玉猪龙等具有特殊内涵的玉器,以及“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等仪式性建筑。红山文化又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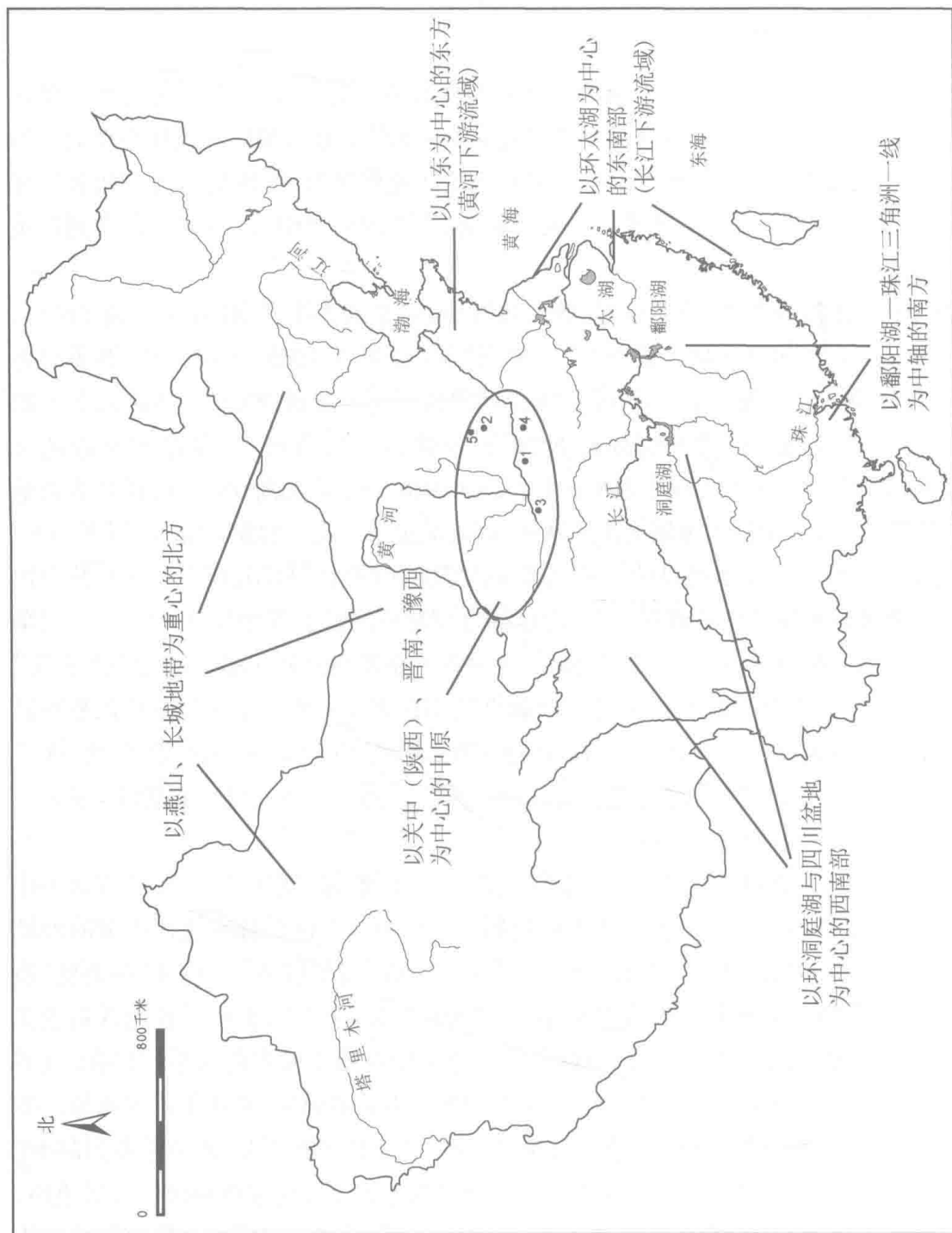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史前六大考古文化区(苏秉琦,1997b)

- 1. 仰韶 2. 半坡 3. 殷墟 4. 裴李岗 5. 磁山

到了以汾河流域为中心的、大型墓葬中随葬石磬和鳄鱼皮鼓的陶寺文化。可见,在对中国史前时代社会发展或文明化进程的讨论中,苏秉琦采取的仍然是“一体化”的视角,即仍然认为这一过程是一出大戏,只不过主角没有被黄河流域独占,而是在不同时期由不同地区分别承担。苏秉琦还将文明火炬接力与古史传说相联系,试图把区系类型嵌入古史记载的人文地理背景,建立考古资料与古史记载的联系。

四、“重瓣花朵”

严文明提出的“重瓣花朵”模式实际是有“花心”的“多元一体”模式。他在1987年发表的经典文章中指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它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这一大中原地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这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包括福建的昙石山文化、台湾的大坌坑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以及云南宾川白羊村、西藏昌都卡若、黑龙江新开流和昂昂溪、从内蒙到新疆的诸细石器文化等。……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第一个层次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严文明1987)。赵辉对重瓣花朵格局何时形成、中原何时成为中心进行了阐述,认为在公元前3000~前2500年之间,中原文化区开始出现,中国新石器文化呈现出以中原为中心的三重结构。

这一模式非常明确地提出大中原地区处于核心地位,但并没有像“黄河流域中心”模式一样强调中原地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具有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推动着周边地区的发展,而是认为中原在文化上的核心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地理上的核心位置决定的——中原因为位居花心,“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即中原地区因地理优势而形成文化交流优势,再形成文化发展的优势,最终由地理上的核心发展为文化上的核心,造成“重瓣花朵”格局。这一格局是“一种分层次的向心结构”,“这种格局不但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也就是说,中原仍然是维系各地区文化、构成史前中国文化体系的关键,但这种“维系”靠的是凝聚力,而不单纯是影响力。

“重瓣花朵”模式还非常明确地试图将各文化区系与文献记载的古代部族对应,提出中原地区“根据古史传说,这一带曾是黄帝和炎帝为代表的部落集团活动的地域,以后在这里形成华夏各族”;甘青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应是往后戎羌各族的史前文化”;在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就应是东夷诸族的史前文化”;燕辽地区古文化可能是燕文化的重要渊源;长江中游孕育了楚文化;长江下游诸文化应是古越族的史前文化。通过

这种对应,史前时代与后来的历史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一模式赋予中原的核心位置使得夏王朝在中原出现成为“史前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模式的向心结构“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即使在某些时期政治上发生分裂割据,这种民族的和文化的凝聚力量也毫不减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由此,史前文化格局不但奠定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基础,而且预示甚至决定了后来历史发展的大方向。

此模式在尊重各地区沿各具特征的道路独立发展、各有优势的同时,强调了中原地区的核心作用,是对“黄河流域中心”模式和“区系类型”模式的整合,力求兼顾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更为重要的是,此模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史前的“重瓣花朵”格局奠定了历史时期直至现代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石,也就是明确提出了历史时期和现代中国有一个史前的基础,中国的形成是一个自史前时代就已经启动的发展程序。

此模式以中原的核心地位作为维系各周边地区为一体的纽带,但没有明确说明在“重瓣花朵”格局出现之前(或公元前 3000 年之前),是否存在一个没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而且,自公元前 3000 年之后,中原地区在史前时期是否一直是向心力的中心所在,是一个颇值得商榷的问题。

五、“中国相互作用圈”

几乎在“重瓣花朵”模式提出的同时,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在 1986 年出版的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古代中国考古学》)第四版中,张光直将公元前 4000 年的中国新石器文化分为红山、小珠山、仰韶、大汶口、大溪、山背、马家浜、河姆渡、石峡—昙石山—凤鼻头九个文化系统(图 1-2),他借用了美国学者葛德伟(Joseph R. Caldwell)在讨论美国东部印第安人文化时使用的相互作用圈(Sphere of Interaction)概念,提出:“到了约公元前 4000 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为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境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这个在公元前 4000 年前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我们应当如何指称?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完全中立的名词而称之为 X,可是我们也不妨径便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张光直 1989)

这一模式同样强调中国史前时代存在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区,但与“区系类型”模式不同,它非常明确地强调了各地区的一体性,并以考古资料可以明确显示出来的各文化区间的密切联系和互动作为将各地区凝结为一个整体的纽带。与“重瓣花朵”模式不同,它并未强